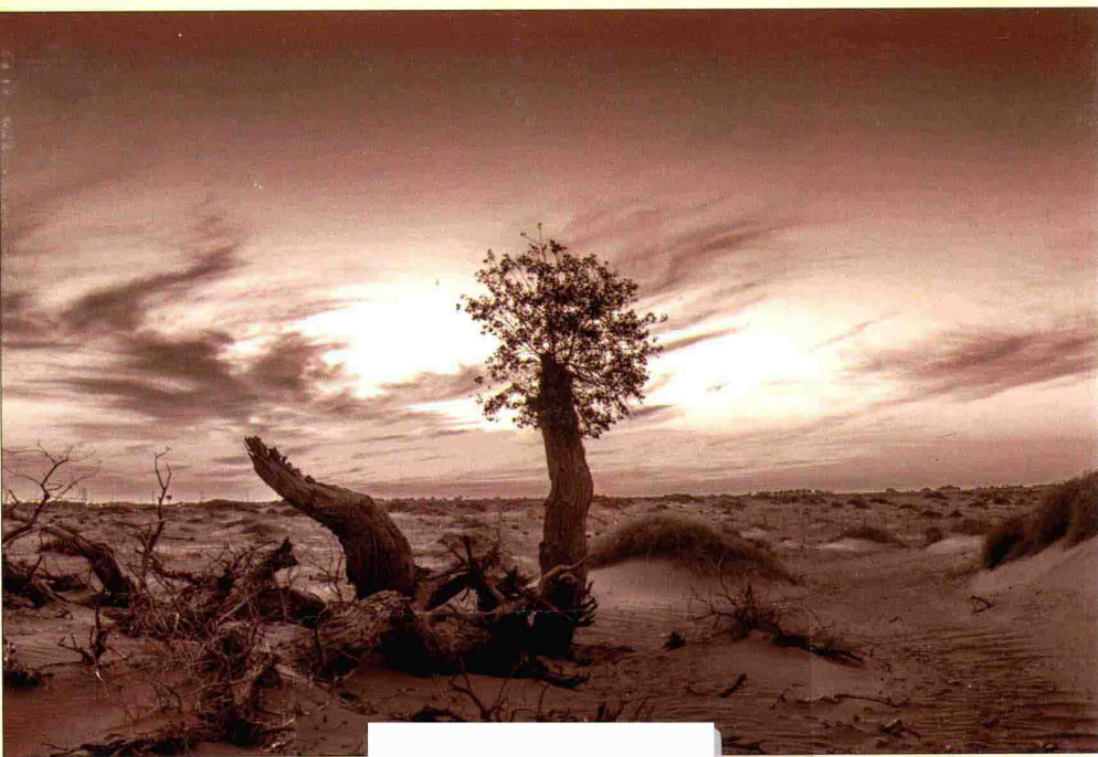




华夏文明之源

陇右风情



漫 唱

叶 舟 / 著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华夏文明之源

| 陇 | 右 | 风 | 情 |



MANCHANG

漫 唱

叶 舟 / 著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漫唱 / 叶舟著. -- 兰州 :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7-5527-0376-4

I. ①漫… II. ①叶…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98217 号

漫 唱

华夏文明之源·历史文化丛书

叶舟 著

出 版 人: 王永生

责任编辑: 杨继军

美术编辑: 马吉庆

校 对: 张家骥

出版发行: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邮 编: 730030

电 话: 0931-8773257 0931-8773149(编辑部)

0931-8773112 0931-8773269(发行部)

E-mail: gsart@126.com

网 址: <http://www.gansuarts.com>

印 刷: 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 张: 13.25

插 页: 2

字 数: 166 千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 2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527-0376-4

定 价: 3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总 序

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甘肃作为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不仅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宝库，而且参与谱写了华夏文明辉煌灿烂的篇章，为华夏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甘肃长廊作为古代西北丝绸之路的枢纽地，历史上一直是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交汇的锋面和前沿地带，是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历史舞台，不仅如此，这里还是世界古代四大文明的交汇融合之地。正如季羨林先生所言：“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因此，甘肃不仅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华夏的“民族走廊”（费孝通）和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宝库，而且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国防安全的重要战略通道和纵深。

自古就有“羲里”、“娲乡”之称的甘肃，是传

说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女娲的诞生地。距今 8000 年的大地湾文化，拥有 6 项中国考古之最：中国最早的旱作农业标本、中国最早的彩陶、中国文字最早的雏形、中国最早的宫殿式建筑、中国最早的“混凝土”地面、中国最早的绘画，被称为“黄土高原上的文化奇迹”。兴盛于距今 5000—4000 年之间的马家窑文化，以其彩陶出土数量最多、造型最为独特、色彩绚丽、纹饰精美，代表了中国彩陶艺术的最高成就，达到了世界彩陶艺术的巅峰。东乡林家遗址出土的马家窑文化青铜刀，被誉为“中华第一刀”，将我国使用青铜器的时间提早到距今约 5000 年。从马家窑文化到齐家文化，甘肃成为中国最早从事冶金生产的重要地区之一。不仅如此，大地湾文化遗址和马家窑文化遗址的考古还证明甘肃是中国旱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是中亚、西亚农业文明的交流和扩散区。“西北多民族共同融合和发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甘肃的史前时期”，甘肃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四坝文化、沙井文化等，是“氏族、西戎等西部族群的文化遗存，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在此交融互动，形成了多族群文化汇聚融合的格局，为华夏文明不断注入新鲜血液”（田澍、雍际春）。周秦王朝的先祖在甘肃创业兴邦，最终得以问鼎中原。周先祖以农耕发迹于庆阳，创制了以农耕文化和礼乐文化为特征的周文化；秦人崛起于陇南山地，将中原农耕文化与西戎、北狄等族群文化交融，形成了农牧并举、华戎交汇为特征的早期秦文化。对此，历史学家李学勤认为，前者“奠定了中华民族的礼仪与道德传统”，后者“铸就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两者都为华夏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自汉代张骞通西域以来，横贯甘肃的丝绸之路成为中原联系西域和欧、亚、非的重要通道，在很长一个时期承担着华夏文明与域外文明交汇融合的历史使命。东晋十六国时期，地处甘肃中西部的河西走廊地区

曾先后有五个独立的地方政权交相更替，凉州（今武威）成为汉文化的三个中心之一，“这一时期形成的五凉文化不仅对甘肃文化产生过深刻影响，而且对南北朝文化的兴盛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张兵），并成为隋唐制度文化的源头之一。甘肃的历史地位还充分体现在它对华夏文明存续的历史贡献上，历史学家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慨叹道，“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斯则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详论者也”，“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时期，中原魏晋以降的文化转移保存于江东和河西（此处的河西指河西走廊，重点在河西，覆盖甘肃全省——引者注），后来的河西文化为北魏、北齐所接纳吸收，遂成为隋唐文化的重要来源。因此，在华夏文明曾出现断裂的危机之时，河西文化上承秦汉下启隋唐，使华夏文明得以延续，实为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链条。隋唐时期，武威、张掖、敦煌成为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国际化都市，中西方文明交汇达到顶峰。自宋代以降，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全国经济重心遂向东向南转移，西北丝绸之路逐渐走过了它的繁盛期。

“丝绸之路三千里，华夏文明八千年。”这是甘肃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的生动写照，也是对甘肃历史文化地位和特色的最好诠释。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这里的历史文化累积深厚，永靖恐龙足印群与和政古动物化石群堪称世界瑰宝，还有距今 8000 年的大地湾文化、世界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东方雕塑馆”天水麦积山石窟、藏传佛教

格鲁派六大宗主寺之一的拉卜楞寺、“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道源圣地”崆峒山以及西藏归属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历史见证的武威白塔寺、中国旅游标志——武威出土的铜奔马、中国邮政形象代表——嘉峪关出土的“驿使”等等。这里的民族民俗文化绚烂多彩，红色文化星罗棋布，是国家12个重点红色旅游省区之一。现代文化闪耀夺目，《读者》杂志被誉为“中国人的心灵读本”，舞剧《丝路花雨》《大梦敦煌》成为中华民族舞剧的“双子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在甘肃境内蜿蜒900多公里，孕育了以农耕和民俗文化为核心的黄河文化。甘肃的历史遗产、经典文化、民族民俗文化、旅游观光文化等四类文化资源丰度排名全国第五位，堪称中华民族文化瑰宝。总之，在甘肃这片古老神奇的土地上，孕育形成的始祖文化、黄河文化、丝绸之路文化、敦煌文化、民族文化和红色文化等，以其文化上的混融性、多元性、包容性、渗透性，承载着华夏文明的博大精深，融汇着古今中外多种文化元素的丰富内涵，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传承和精神财富。

甘肃历史的辉煌和文化积淀之深厚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时也要看到，甘肃仍然是一个地处内陆的西部欠发达省份。如何肩负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国家战略，担当好向西开放前沿的国家使命，如何充分利用国家批复的甘肃省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这一文化发展战略平台，推动甘肃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和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成为甘肃面临的新的挑战 and 机遇。目前，甘肃已经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段”与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统筹布局，作为探索经济欠发达但文化资源富集地区的发展新路。如何通过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建设使华夏的优秀文化传统在现代语境中得以激活，成为融入现代化进程的“活的文化”，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指出，华夏文明的传承保护与创新，实际上是我国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

建设能够缓冲迅猛的社会转型对于传统文化的冲击，使传统文化在保护区内完成传承、发展和对现代化的适应，最终让传统文化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活的文化”。因此，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建设原则应该是文化与生活、传统与现代的深度融合，是传承与创新、保护与利用的有机统一。要激发各族群众的文化主体性和文化创造热情，抓住激活文化精神内涵这个关键，真正把传承与创新、保护与发展体现在整个华夏文明的挖掘、整理、传承、展示和发展的全过程，实现文化、生态、经济、社会、政治等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华夏文化是由我国各族人民创造的“一体多元”的文化，形式是多样的，文化发展的谱系是多样的，文化的表现形式也是多样的，因此，要在理论上深入研究华夏文化与现代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华夏文化现代化的自身逻辑，让各族文化在符合自身逻辑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要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和文化生态保护的问题，在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中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实现文化传承保护的生态化，避免文化发展的“异化”和过度开发。坚决反对文化保护上的两种极端倾向：为了保护而保护的“文化保护主义”和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忽视文化价值实现的“文化经济主义”。在文化的传承创新中要清醒地认识到，华夏传统文化具有不同层次、形式多样的价值，建立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不是在中华民族现代化的洪流中开辟一个“文化孤岛”，而是通过传承创新的方式争取文化发展的有利条件，使华夏文化能够在自身特性的基础上，按照自身的文化发展逻辑实现现代化。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总摄、整合和发展华夏文化的内涵及其价值观念，使华夏的优秀文化传统在现代语境中得到激活，尤其是文化精神内涵得到激活。这是对华夏文明传承创新的理性、科学的文化认知与文化发展观，这是历史意识、未来眼光和对现实方位准确把握的充分彰显。我们相信，立足传承文明、创新发展的新起点，

随着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战略的推进，甘肃一定会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黄金段”，再次肩负起中国向西开放前沿的国家使命，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创新与传播谱写新的壮美篇章。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策划编辑了这套《华夏文明之源·历史文化丛书》。“丛书”以全新的文化视角和全球化的文化视野，深入把握甘肃与华夏文明史密切相关的历史脉络，充分挖掘甘肃历史进程中与华夏文明史有密切关联的亮点、节点，以此探寻文化发展的脉络、民族交融的驳杂色彩、宗教文化流布的轨迹、历史演进的关联，多视角呈现甘肃作为华夏文明之源的文化独特性和杂糅性，生动展示绚丽甘肃作为华夏文明之源的深厚历史文化积淀和异彩纷呈的文化图景，形象地书写甘肃在华夏文明史上的历史地位和突出贡献，将一个多元、开放、包容、神奇的甘肃呈现给读者。

按照甘肃历史文化的特质和演进规律以及与华夏文明史之间的关联，“丛书”规划了“陇文化的历史面孔、民族与宗教、河西故事、敦煌文化、丝绸之路、石窟艺术、考古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河陇人物、陇右风情、自然物语、红色文化、现代文明”等13个板块，以展示和传播甘肃丰富多彩、积淀深厚的优秀文化。“丛书”将以陇右创世神话与古史传说开篇，让读者追寻周先祖文化和秦早期文明的遗迹，纵览史不绝书的五凉文化，云游神秘的河陇西夏文化，在历史的记忆中描绘华夏文明之源的全景。随“凿空”西域第一人张骞，开启“丝绸之路”文明，踏入梦想的边疆，流连于丝路上的佛光塔影、古道西风，感受奔驰的马蹄声，与行进在丝绸古道上的商旅、使团、贬谪的官员、移民擦肩而过。走进“敦煌文化”的历史画卷，随着飞天花雨下的佛陀微笑在沙漠绿洲起舞，在佛光照耀下的三危山，一起进行千佛洞的千年营建，一同解开藏经洞封闭的千年之谜。打捞“河西故事”的碎片，明月

边关的诗歌情怀让人沉醉，遥望远去的塞上烽烟，点染公主和亲中那历史深处的一抹胭脂红，更觉岁月沧桑。在“考古发现”系列里，竹简的惊世表情、黑水国遗址、长城烽燧和地下画廊，历史的密码让心灵震撼；寻迹石上，在碑刻摩崖、彩陶艺术、青铜艺术面前流连忘返。走进莫高窟、马蹄寺石窟、天梯山石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北石窟寺、南石窟寺，沿着中国的“石窟艺术”长廊，发现和感知石窟艺术的独特魅力。从天境——祁连山走入“自然物语”系列，感受大地的呼吸——沙的世界、丹霞地貌、七一冰川，阅读湿地生态笔记，倾听水的故事。要品味“陇右风情”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神奇，必须一路乘坐羊皮筏子，观看黄河水车与河道桥梁，品尝牛肉面的兰州味道，然后再去神秘的西部古城探幽，欣赏古朴的陇右民居和绮丽的服饰艺术；另一路则要去仔细聆听来自民间的秘密，探寻多彩风情的民俗、流光溢彩的民间美术、妙手巧工的传统技艺、箫管曲长的传统音乐、霓裳羽衣的传统舞蹈。最后的乐章属于现代，在“红色文化”里，回望南梁政权、哈达铺与榜罗镇、会宁三军会师、西路军血战河西的历史，再一次感受解放区妇女封芝琴（刘巧儿原型）争取婚姻自由的传奇；“现代文明”系列记录了共和国长子——中国石化工业的成长记忆、中国人的航天梦、中国重离子之光、镍都传奇以及从书院学堂到现代教育，还有中国舞剧的“双子星”。总之，“丛书”沿着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探究华夏文明演变的轨迹，力图实现细节透视和历史全貌展示的完美结合。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积累多年的文化和出版资源为基础，集省内外文化精英之力量，立足学术背景，采用叙述体的写作风格和讲故事的书写方式，力求使“丛书”做到历史真实、叙述生动、图文并茂，融学术性、故事性、趣味性、可读性为一体，真正成为一套书写“华夏文明之源”暨甘肃历史文化的精品人文读本。同时，为保证图书

内容的准确性和严谨性，编委会邀请了甘肃省丝绸之路与华夏文明传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兰州大学以及敦煌研究院等多家单位的专家和学者参与审稿，以确保图书的学术质量。

《华夏文明之源·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2014年8月

目

录

Contents

001	花儿：河源上游的奇迹之花
032	经历：这片青铜之地，是我用身体丈量出来的
078	梅花消息·原创花儿音乐剧
152	仿花儿(组诗)

花 儿：

河源上游的奇迹之花

在我的认知和理解上，“西北花儿”乃是一种穷人的诗歌、贫瘠的宗教、汉语的净土、灵魂的抒唱、爱情的燭火……它是一朵花，慰藉人心；它是一份营养，光耀人性；它还是一种唱读，说出人道和关怀。

我所谈及的事迹，肯定和一种花有关。

日月经行，昼夜不舍。在黄河上游的这大大小小的高地上，这种花本来是一种常识，一种素朴的认知：无论在田间沟壑、林间草柯，或是在散落的黄泥小院和焦山渴水的视野中，它是一种日常的色彩，一份寄托，一点暖意，点缀在劳作和生息的土地上，随顺自然，花开花落。高地的寒凉和自然环境的恶劣，使这种花有了一种挣扎的色彩，一副夺目和攀援向上的姿态，给人以安慰，予人以踏实的念想。

随手撒下的一把花籽，落地生根，蓬勃茁壮，葳蕤摇曳，使四序变得泾渭分明，让生计呈现出明朗和灿烂的一面。在满目疮痍的黄泥村落中，他们除了拾掇粮食、牲口和儿女外，还要侍弄一丛丛花木，煨心养目，苦度时日。在冬天，他们要背净山上的肥雪，储藏化水，以待来

年；在夏日的焦干中，他们悉心服侍，以水喂养，而后扶住花木，心中的嗓子破绽而出，一曲曲歌谣会漫漶而泻，沸反盈天，缭绕不绝。

因此，他们用视野里最美的事物，来命名这种心中的歌谣——这便是河源上游无处不在的“西北花儿”。

这种花名曰“牡丹”。

在 W·爱伯哈德的《中国文化象征词典》里，这样论述了这种花：牡丹 (Peony)，乃是“花之王后”。它从前叫“芍药”，大约从公元 5 世纪时起，就已有人将它称为“牡丹”了。在《诗经》中，热恋的青年男女就相互赠以芍药。牡丹大约是 8 世纪时，从过去土生的芍药花中培植出的。牡丹花有各种颜色，但是从过去到今天，红色的牡丹花始终是最名贵的。白牡丹象征着美丽而又聪明的年青姑娘。传说有个叫做“白牡丹”的女人，向仙人吕洞宾挑战，最后还是女人获得了胜利。宋人欧阳修曾专为白牡丹写过一本书。唐代的诗人们曾在他们的诗作中歌颂过牡丹。

在许多时代，“牡丹”几乎成了“花”的代名词。

有个可以追溯到明代的戏曲中，说则天皇帝曾傲慢地下令所有花必须立刻开放，结果只有牡丹花不服从她的命令。这个情节后来还被加以扩充，写进了小说《镜花缘》中。在俗语中，“牡丹”指一个魅力能使人神魂颠倒的年青美女。民歌中唱道：“等到园中牡丹开”、“牡丹花开香千里，引得花开彩蝶来”、“牡丹花开情郎摘”。（这里，“牡丹”指姑娘，“花、蝶”指小伙子。）更特别的是：“露珠滴下牡丹开”。

在绘画中，牡丹常与荷花、梅花、菊花等在一起，它们象征着四季，牡丹代表春天所开的花。牡丹与芙蓉画在一起，表示“荣华富贵”。其他还有：与海棠在一起，表示“光耀门庭”；与桃在一起，表示“长寿、富贵与荣誉”；与松树和石头在一起，表示“富贵、荣誉和长寿”。

爱氏的评论，因了他的熟稔和资料，或许能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

一词条搜罗殆尽，尽情铺陈，泼墨渲染。但他也难免挂一漏万，遗缺了黄河上游这一重要的文化现象——西北花儿。他缺乏的不是眼光与趣味，不是材料的堆砌；相反，他失于对草根阶层的文化关注与情怀，更失于真正的田野调查。

在河源上游的文化进程中，被那些“沉默的大多数”用“牡丹”一词所命名的“西北花儿”——更多地代表了一种民间的口述史，一册疏离于主流文化的边疆歌谣史。

由此，牡丹成了“花儿”的象征。

它在歌名、曲调名、唱词、衬句中，几乎达到了无所不在的地步，其显赫的地位和人们赞美的程度，已到了“牡丹崇拜”的巅峰。据专家王沛先生考证，这种“花神崇拜”与《诗经》中的“赠之以芍药”（即牡丹）的诗句，以及与唐宋之际的中原一带崇尚牡丹的习俗是一致的。

在黄河上游的滩涂两岸，生活的艰辛和寂寞的劳作，只能用一种简约的方式来舒缓和表达。于是，在黄泥涂抹的村落巷道，在高耸入云的清真寺墙上，以牡丹为核心的花卉砖雕，丝丝入扣，逼真形象。《河州花儿研究》中记载，1980年5月，在临夏（古河州）市南龙乡发掘的金代墓葬，是金大定十五年（1175）进义校尉王吉的砖墓，墓内浮雕有“王祥卧冰”、“深山葬母”等孝子贤孙的故事，更有许多雕刻精美、造型生动的牡丹等花卉图案。所以，从久远的古代起，牡丹不仅是人们歌咏的美之化身，而且深入到百姓生活的诸多领域，成了民间艺人进行创作的吉祥物。

在歌声如潮、嗓音泛滥的河源上游，牡丹本来是一种素朴的常识。但随着岁月的更迭，薪火的传承，它又突破了常识，成了一种寄托和象征的替代物。在这一带，“栽牡丹树”、“浪牡丹月”、“绣牡丹花”、“剪牡丹图”、“喝牡丹酒”成了一份世代继承下来的习俗，甚至到了爱

牡丹成癖的地步。如：

花儿里俊不过红牡丹（呀）丹，
人里头好不过少年。

尕妹是牡丹（者）将开开，
阿哥是绿叶（者）配哩。

一个词一旦成了象征物，它就有了被寄托的可能；而以它去命名一桩神圣的事迹，则代表了一种理解力和慧眼。在河源上游的中心区以这种边疆歌谣“花儿”为主要文化象征的河州一带，盛产紫斑牡丹，另有粉西施、艳南、大红袍、绿牡丹、紫二乔、醉胭脂、象牙白、金花状元等上百个品种（李嘉钰先生考证）。张亚雄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说：“世称牡丹以洛阳产者为贵，故又称牡丹曰‘洛花’。相传洛阳名花，本来借种河州，则河州牡丹甲天下矣。”诚哉斯言。

花神降临，以“花儿”命名的这种山歌，使诸如“少年”、“山歌”、“野曲”、“大山歌”之类的纷乱称谓归于统一，也更易于人们理解。不仅如此，“花儿”还进一步指称着对异性的爱欲——特别是唱词中大量的对作为“意中人”的“牡丹”的比喻和赞美。因此，以“花儿”来命名这种山歌便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如：“我维下的花儿（哈）你没有见/赛过了才开的牡丹”；“想起个花儿（者）哭下了/吃不下羊羔的肉了”，等等。后来，在男女对酬的咏唱中，为了角色的需要，这种山歌又有了“少年”这一称谓，如：“多少的男子汉我没有要/端要了十八的少年”；“少年人爱的是红牡丹/没怕个山高（么）路远”。

但“少年”终究是“花儿”这种称谓的词义延伸和扩展运用。

逝者如斯，歌音未绝。在那些水上运输的筏子客，吆驴赶马的脚户哥，架设飞檐的巧木匠，背弓弹毛的擀毡匠，清真风味的馆子家，四方盈利的买卖人和浪山漫歌的唱把式眼中，“牡丹”回归到了它的本义，“花儿”成了一种常识性的认知。现在，这种事迹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普通得像一碗油泼辣子的长面，像一筐秋天拾起的疲惫的洋芋蛋。

但它却是不可或缺的食粮，是养人性命的营养。在天远地偏的河源上游，在荒凉焦干的旱塬和沟峁上，漫一首“花儿”，能送落太阳，迎出月亮。

我所谈及的事迹，肯定和一种地理有关。

因为，任何一种文明都跟地理环境分不开。比如希腊，它的文明就是被石头和海水填充起来的：神庙、雕像、殿堂……在埃利蒂斯的作品中，能清楚地看到海水和石头如何构建了这一种文明的内涵——石头是他们的家，海水是他们的想象。海平面使他们对远方的世界充满好奇，眼神凝视；而石头则叫他们的心里踏实，有一份自信和雍容的气度。

论及东方大陆腹地深处的这一种民歌，也莫不如此。

溯源而上，大鹰挂在天上，雪山危峙，罡风浩荡，上游的黄河水越变越窄，越来越薄，几近于透明。终于，它们变成了无数神经末梢般的经络，散布在草原、地表、山涧之中，脉流不止，交织成了一片水网，成为源头和河流。

在这篇文字中，我称它们为“河源上游”。

河源上游的这片高地，仿佛一块青铜，被岁月的吹鸣和风沙一再哑埋下。但在青铜深处，还保存着一息尚存的铜灯，映照着边疆的生民，护卫着自己的念想。假以时日，青铜花开，就会在它遒劲的枝条下，诞生下牛羊和马匹，呈现出诗卷与歌谣；同时，艰辛和煎熬的生